发展中国家政治与对外关系  
**Politic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授课教师**俞沂暄 讲师（[yuyixuan@fudan.edu.cn](mailto:yuyixuan@fudan.edu.cn)）

**助教**朱定泽

**目录**

[第一讲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4](#_Toc198194417)

[一、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概念 4](#_Toc198194418)

[（一）用于指代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概念 4](#_Toc198194419)

[（二）“第三世界” 4](#_Toc198194420)

[二、经济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 5](#_Toc198194421)

[（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 5](#_Toc198194422)

[（二）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 5](#_Toc198194423)

[（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7](#_Toc198194424)

[三、政治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 9](#_Toc198194425)

[（一）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兴趣 9](#_Toc198194426)

[（二）政治发展的观点：发展主义 9](#_Toc198194427)

[（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 10](#_Toc198194428)

[四、关注的问题 11](#_Toc198194429)

[第二讲 二战后的第三世界 12](#_Toc198194430)

[一、第三世界的独立发展道路及其挫折 12](#_Toc198194431)

[（一）独立早期领导人的“中间道路”取向 12](#_Toc198194432)

[（二）“中间道路”的三种结局 12](#_Toc198194433)

[（三）第三世界的合作受挫 12](#_Toc198194434)

[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变化 12](#_Toc198194435)

[（一）“民主化” 12](#_Toc198194436)

[（二）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权 13](#_Toc198194437)

[（三）也门统一与动乱 13](#_Toc198194438)

[（四）索马里和卢旺达 13](#_Toc198194439)

[（五）南苏丹独立 13](#_Toc198194440)

[三、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变化 14](#_Toc198194441)

[（一）经济起伏 14](#_Toc198194442)

[（二）国际经济问题 14](#_Toc198194443)

[第三讲 阿根廷 15](#_Toc198194444)

[一、阿根廷概况 15](#_Toc198194445)

[二、阿根廷历史 15](#_Toc198194446)

[（一）殖民者与考迪罗 15](#_Toc198194447)

[（二）现代政党体制与军政府 16](#_Toc198194448)

[三、阿根廷基本政治制度 16](#_Toc198194449)

[四、阿根廷的主要问题 16](#_Toc198194450)

[（一）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走入下滑通道 16](#_Toc198194451)

[（二）是否形成了稳定的政治 17](#_Toc198194452)

[（三）军队的角色 18](#_Toc198194453)

[第四讲 南非 18](#_Toc198194454)

[一、南非概况 19](#_Toc198194455)

[二、南非历史 19](#_Toc198194456)

[（一）殖民者与种族隔离 19](#_Toc198194457)

[（二）非国大与黑人解放 19](#_Toc198194458)

[三、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与维持 20](#_Toc198194459)

[（一）建立种族隔离制度的动因 20](#_Toc198194460)

[（二）种族隔离制度维持的原因 20](#_Toc198194461)

[四、新南非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20](#_Toc198194462)

[（一）经济状况不佳 20](#_Toc198194463)

[（二）经济问题的根源 21](#_Toc198194464)

[（三）土地问题 21](#_Toc198194465)

[（四）政治问题 22](#_Toc198194466)

[第五讲 尼日利亚 22](#_Toc198194467)

[一、尼日利亚概况 22](#_Toc198194468)

[二、尼日利亚历史 22](#_Toc198194469)

[三、尼日利亚经济 23](#_Toc198194470)

[四、尼日利亚的相关问题 23](#_Toc198194471)

[（一）殖民统治对尼日利亚独立后发展的影响 23](#_Toc198194472)

[（二）尼日利亚以族群为代表的前现代集团间关系的影响 23](#_Toc198194473)

[（三）尼日利亚为何没有分裂 24](#_Toc198194474)

[（四）尼日利亚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什么没有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 24](#_Toc198194475)

[第六讲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25](#_Toc198194476)

[一、沙特阿拉伯 25](#_Toc198194477)

[（一）沙特阿拉伯概况 25](#_Toc198194478)

[（二）沙特经济与社会情况 26](#_Toc198194479)

[（三）现代沙特国家的特征 26](#_Toc198194480)

[（四）沙特政治面临的问题 26](#_Toc198194481)

[二、伊朗 27](#_Toc198194482)

[（一）伊朗概况 27](#_Toc198194483)

[（二）伊斯兰革命 27](#_Toc198194484)

[（三）伊朗的政治制度 28](#_Toc198194485)

[三、伊朗和沙特制度差异的原因 28](#_Toc198194486)

[第七讲 泰国 29](#_Toc198194487)

[一、泰国概况 29](#_Toc198194488)

[二、泰国历史 29](#_Toc198194489)

[（一）19至20世纪：近代泰国与军政府的统治 29](#_Toc198194490)

[（二）21世纪：他信势力与动荡的泰国政局 29](#_Toc198194491)

[三、泰国政治制度 30](#_Toc198194492)

[四、泰国政治特征 30](#_Toc198194493)

[（一）军队的特殊地位 30](#_Toc198194494)

第一讲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2025.2.20 / 2025.2.27 / 2025.3.6 / 2025.3.13

一、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概念

（一）用于指代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概念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全球南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概念都或多或少与发展中国家相关。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概念，来源于“南方国家”；而“南方”的称呼又来自于上世纪60~70年代对世界“东西南北”的划分，因为南半球多为发展中国家而北半球多为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时至今日，与“南方国家”相对的是以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世界。

“欠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y）”最初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使用，“不发达国家（un-developed country）”起初则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近乎全同。在当今的政治界与学术界，这两个概念已较为少用。

“新兴民族国家”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外交场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的国家的称呼，在当时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意义一致。

可见，在上述这些术语之中，有些术语是纯描述性的，而另一些术语则具有政治意味。

（二）“第三世界”

1. “三个世界”及其划分

“第三世界国家”是较为常用的指代发展中国家的术语。最早提出“第三世界”概念的是法国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他以法国历史上的“三级制”为灵感，于1952年提出了“三个世界”：

* **第一世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
* **第二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 **第三世界：**上述两类之外的国家。

由此可见，在索维的定义中，第三世界的特征是没有经过工业化且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意味着，索维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实现工业化。在这种划分中，中国应当属于“第二世界”；但也应当注意，当时的索维在定义“三个世界”时，对“第二世界”的定义多是参照苏联制定的，可能并未考虑中国。

我们更为熟悉的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 **第一世界：**美苏；
* **第二世界：**东西欧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
* **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即整个亚非拉（除了日本）。

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对日后中国的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如此划分的根据可以概括为：第一世界既富且强（核武器储量高、打击能力强），第二世界较富较强，第三世界既穷且弱。

2. 冷战之中与之后的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1964年由77国集团在联合国第一届贸发会议上提出。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作为同义词使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的标志性事件、组织包括1955年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

冷战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世界政治两极结构结束后，不依附于两大集团的不结盟运动的意义大大降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立场，共同的政治立场也不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发展途径上与西方趋同，失去了原有的第三条道路或立场的独立地位。可以说，冷战后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已面目全非——按索维的定义，第二世界已然消失；按毛泽东的划分，世界战略图景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第三世界”也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冷战后，“第三世界”的称呼逐渐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是经济发展，而其经济发展水平分化严重，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大国（新兴经济体）与最不发达国家之分。

二、经济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

（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 低生活水平
  + 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
  + 贫富差距极大
  + 赤贫人口（即极端贫困人口，按世行标准为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超过1.9美元）多
  + 预期寿命低、婴儿死亡率高
  + 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 人口出生率高
* 失业率高
* 依靠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

（二）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

发展经济学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发展经济学也产生了诸多理论。

1. 线性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有一种线性的规律，这一规律已被包括英美在内的诸多西欧、北美国家验证，因而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发展规律是非正确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被视作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表象的总结，其中包括以下阶段：

* 传统社会
* 起飞前阶段
* 起飞阶段
* 成熟阶段
* 高消费阶段

罗斯托指出，经济的起飞必须要有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传统）农业与工业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一，农业“靠天吃饭”，以气候为主的自然因素为农业生产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第二，传统社会中农民依靠自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工业社会中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有。因此，只有农业生产率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总剩余才会提高，才有资金进行投资，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工业化逐步发展后，随着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工业生产率提高，经济就逐渐走向起飞了。

虽然作为一个封闭的抽象模型而言，罗斯托的理论揭示了较为正确的规律（尤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但其实践意义非常有限——例如，虽然罗斯托指出了农业生产率要提高，但没能揭示传统农业如何产生剩余；事实上，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是很难产生剩余的。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也显然不是通过农业剩余实现的。人类历史至今唯一能通过传统农业产生剩余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只有20世纪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这一过程也并非罗斯托主张的“自然的”经济增长阶段，而是受国家高组织化强烈干预的结果。此类国家的典例就是中国，而中国又有其特殊条件，如中国悠久的农业传统与水利积淀。

2. 新古典主义理论

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所谓“二元经济”，就是两个经济部门大类：一个是传统的、人口过剩的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城市产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村平均收入，充分就业。那么，一边是人口过剩，另一边是充分就业，就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达到农村产出边际生产率不再为零时，完成经济结构转型。

刘易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数学经济模型，因而忽略了一些因素：例如，城市产业部门从何而来？即使将这一点作为默认条件，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城市产业部门如何能保证持续的充分就业，从而吸引农业人口涌入城市？换言之，就是城市产业部门如何扩大再生产的问题。

要扩大再生产，资产者不能将利润用来消费，而是用来投资；要扩大再生产，需要对一些基础产业（如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这种投资的见效更慢，因而不为资产者所欢迎，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这些规律是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没有提及的。

3. 普雷维什的进口替代模式

普雷维什进口替代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中心-外围”理论，即结构主义这一在批判新古典主义之上形成的流派。普雷维什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只能适用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这样的市场。因此，要首先解决结构问题，即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发达国家以低价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以高价进口发达国家的工业品。

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源于历史。要打破这种恶化，就需要打破“外围”对“中心”依附的结构制约——进口替代，以自行生产替代进口。

在实践上，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执行过进口替代。进口替代可以说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除了一些东亚国家之外，大多数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尤其是在拉美和非洲）都失败了，失败的标志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中世界陷入的债务危机。它们之所以陷入债务危机，在于低竞争力的产业加上高关税的贸易保护的不合理匹配；此外，进口替代一般由国家大力支持，投入巨大资源，导致大量人员涌入进口替代的产业，形成冗员，加大成本。工业生产的复杂性也是原因之一，资本、技术等流程之间无法打通，就需要进口，进口依赖硬通货，硬通货不能依赖低竞争力的工业品，于是只能依赖其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但是，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又已经忽视了农业，农产品的出口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只能举债；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下的美联储宣布加息，发展中国家发现它们已无法还清债务，债务危机由此爆发。

进口替代理论在理论上相比线性发展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有了一定进步，但在实践上遭遇了重大挫折。当然，进口替代理论虽有问题，但“进口替代”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4. 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是阿明的依附型经济理论。阿明指出，依附型经济不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简单地依附于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因为外围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资本和劳动等都分散在各个外向型部门里，不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国民经济看待。外围国家经济的各个部门分别和世界经济的某些分支联系在一起，而相互之间却是分割的，在国家层面无法形成统一的经济合力。依赖外国投资和援助使得本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有利于跨国公司谋取利益，加剧了国内的分化，加深了依附地位。

针对此类依附型经济，阿明难以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唯一提出的方案“孤立”，在实践上也较难落实。

5. 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末，上述理论乃至整个发展经济学都陷入困境，因为理论无法回应70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和困境。从此，新自由主义重新夺回对世界经济、第三世界发展问题解释的主导权。

（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1. 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前发展中国家主要采用的结构主义路线，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按市场规律发展经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债务危机，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

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按新自由主义进行的“结构调整”，其总体思路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参照系。1981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伯格报告》，即《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发展的行动纲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部分接受《伯格报告》，但迎来了失败的结局——“掉进了深井”：低投资、失业增加、社会福利削减、消费减少、生产下降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财政纪律，减少财政支出，这导致了投资减少，原有的产业也难以维持，失业于是增加，福利于是削减，消费也随之减少。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彻底摧毁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本就脆弱的经济结构；直到21世纪，这些国家的经济才有所回升。

2. 对东亚经济成功的研究——制度主义

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大多陷入困境时，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基于对东亚（不包括中国）研究的制度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外部约束，但倘若一国的政策足够有力，就能够抗衡这些外部约束。当然，此类抗衡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强有力的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

要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就需要一场政治社会变革，就要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经济集团影响政府的权威和权力，其中前者在东亚国家就主要指大土地所有者；而东亚国家（及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都进行过土地改革，破除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解放了农民的人身依附。此外，东亚的中央集权的传统也在其中提供了助力。要建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就需要在社会变革之中建立良好的制度，调整产业界与政界的关系。

在确保了强有力的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后，就要出台合适的产业政策，在一段时期的进口替代后，及时转向出口导向。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关键。出口导向产业大多为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产业，面向的市场则是已有的国际市场，产业具有竞争力，能够产生相当的利润，由此就能吸引投资，扩大再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还会调整产业政策，开拓新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也有一些制度主义学者指出，东亚经济腾飞还有一个辅助条件，即国际契机。例如，日、韩由于处于冷战的前线，因而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中国把握的国际契机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浪潮，以及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国际契机”只是一个“辅助条件”吗？讲师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外部因素的重要性远超内部因素。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源头来自外部；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的债务危机，其直接原因是美联储加息；日、韩等国的成功之中，美国扮演的角色被严重低估了。因此，没有国际契机，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发展其经济的。

3.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同样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成功的解释。“新结构主义”对应的是“旧结构主义”，如普雷维什的政府主导进口替代思想。新结构主义承认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落后与经济环境的不利，但其认为仅靠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不行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没有那样的治理效能；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应当是市场，由市场的信号告诉政府其比较优势，从而激活要素禀赋。

虽然都强调市场，但与新古典主义不同的是，新结构主义强调市场体系是需要培育的，而这个培育的工作就有赖于政府。政府还需要解决一些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外部性，如基础设施、物流、能源、电力等；此外，政府还要塑造良好的市场软环境，如推行税收优惠政策等。当然，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些建设、执行这些政策是困难的，因此可以在局部予以落实，设立工业园区、经济特区。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没有特别强调国际性的因素，避免了制度主义的“产业转移论”中产业转移被人为限制的可能性。

总之，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是：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是内生的、变动的，但是每一个特定时间点的要素禀赋是确定的；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市场确定要素禀赋。有效的市场能够形成反映要素稀缺性的灵敏的价格体系，引导企业按比较优势选择产业，从而形成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带来利润，形成资本积累，有竞争力的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良性循环。

4. 格申克龙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观点

格申克龙提出了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后发优势”。他指出，落后国家工业化可以应用最先进的技术，而较先进的国家可能由于惯性，或者由于改变原有生产布局的成本，反而在技术更新方面犹豫不决；落后国家工业化倾向于大规模工厂的建设和生产资料生产；落后国家工业化是对先进国家的模仿，但模仿中伴随的决定性要素来自本土。

需要注意的是，后发优势是有前提的。格申克龙的主要理论发表于20世纪中叶，在此处提及的“落后国家”是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它们相对于英国在工业上是有代差的，但这一差距并非很大。可见，后发优势的前提是：第一，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差距相对有限；第二，后发优势是相对于某个国家的，如明治维新后日本相对于普鲁士的后发优势、二战后的德国相对于英国的后发优势。由此可见，格申克龙的理论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也因此难以广泛适用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优势理论的应用之处往往在于某个特定的产业的发展。

纵观以上理论，讲师认为，其共有的不足在于对国际因素的忽视。在东亚经济崛起的典例中，美国在冷战前中期采取的政策对日、韩，乃至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冷战结束后，东亚、东南亚的国际政治安全环境较为良好，因此诸多发展中国家得以抓住发展的契机；此外，在上述过程中，先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措施也较少。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还在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只有一个对其友好的国际环境才能为其提供有利的发展资金。

以上理论还共同揭示了一点：发展中国家要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工业化。正如“农业剩余论”中提及的传统农业与工业的不同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农业极大地限制了一国经济发展的上限，工业能够解除这一上限。工业化的道路，总的来说也可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前者能自行地产生农业剩余，后者则主要不是依靠本国的农业剩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这也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化大生产；理论上，社会主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公有制回归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卡尔·马克思、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资本论》

三、政治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

（一）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兴趣

20世纪50年代，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向关注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这是因为当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国家，西方从之前对殖民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变为了对新兴国家政治的研究。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则有三个渊源：第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研究；第二，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美国的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三，最初的国际政治分工研究。

（二）政治发展的观点：发展主义

1. 发展主义的内容

发展主义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观点之一，其主要内容是：第三世界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先后顺序上，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社会多元-政治民主是一个普遍的、相互协调的过程。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罗斯托、李普塞特等。

2. 对发展主义的批评

亨廷顿于1968年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发展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政治发展/民主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不会协调并进；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获得增长的同时，政治上反而更加动荡不安；各国政治最重要的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

3. 发展主义的回归

20世纪80至90年代出现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许多军人政权和“威权主义”政权和平转化为“民主”制度，从70年代中期的南欧开始，70年代末、80年代扩散到拉美，80年代后期扩散到东亚、苏东。在这一背景下，“政治民主”被再次强调，发展主义又回归了西方政治发展观点。

（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

1960年，阿尔蒙德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中，以结构功能主义而非传统的“地区性研究”为方法，根据政治结构行使政治功能的方式来比较各个政治体系。

欧美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分类，主要有以下标准：军政府还是文人政府；政教分离的政府还是政教合一的政府；是否有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这三个标准都涉及现代国家的问题：第一，现代政治中文武关系的核心是军队服从于政治意志，而非文官服从于武装力量的“军阀”；第二，现代国家是世俗化的；第三，现代国家是大众民主的国家，要参与政治只能通过政党竞选进行。

1. 民主模式

民主模式是二战结束至60年代初，独立后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制度。其基本上模仿了西方的民主制形式：选举与多党制。但是，此类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绩效如若不佳，就往往会转变为一党制或在60年代军事政变中垮台。

2. 精英-动员模式

精英-动员模式主要为革命后国家采用，要求具有通过革命树立起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具有能够动员民众的意识形态和比较强大的政党。这一模式通过政治经济变革实现快速发展、社会公平。典例有墨西哥、埃及、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

3. 官僚-权威模式

官僚-权威模式即所谓的“威权主义”，通常是重大危机的产物，表现为军人政权和一党制政权。奥唐奈尔总结了四点军人政权特征：

1. 以高度垄断化和跨国化的上层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
2. 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经济的官僚组成压制性的政权体制；
3. 上述两大集团组成排斥性政治体系，用严厉的控制手段清除先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民众阶层；
4. 经济上推行有利于私人寡头的资本积累模式，加剧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这一模式广泛见于20世纪的拉丁美洲，但这一概念目前已经被滥用，偏离了其原有的界定。

4. 非洲的一党制政权

1952年至80年代末，非洲发生120多起军事政变，成功72起。70至80年代，非洲的多党制国家多改行一党制。80年代末，非洲51个独立国家中，实行多党民主制的只有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南非是一个特例，其在白人范围内实行议会民主制。

非洲的一党制与拉美的官僚-权威模式有所不同：后者有强大的右翼统治集团，前者则没有；后者还有较为完备的政府效能，前者则同样没有。

5. 中东产油酋长国模式

中东的一些国家依靠石油获得高速经济增长，有着比较好的大众福利政策，保持了传统世袭结构和政治结构，传统世袭统治与官僚组织结合。

除了上述模式外，还有以伊朗为代表的现代政教合一模式。

总的来说，美国学者对第三世界政治的研究，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取向：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稳定的多党竞争选举制度。但是，正如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难以被线性发展理论所解释，实际上在更多地受到了外部影响，发达国家的政治也无法被这种“多党竞争选举制度”的参考系所完全解释。发达国家的政治之所以成熟，是因为它们有稳定的官僚制（行政体系）以及有限政府（即市场经济不受政府控制，仅由法治管控），但这两点在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具备。

多党竞争意味着政党的存在，而政党的前提是从所有他赖以求助的共同体（如部落、家族、行会等）中脱离出来的个体化的人——在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此类个体化的人是资产阶级，此时他们有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却无政治权利。现代政党并未在资产阶级中出现，因为他们并未有迫切的组织需要；是当工人因高度集中且脱离共同体而需要组织时，才出现了现代政党。因此，是在第一个现代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现后，资产阶级的政党才开始组织起来，争取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的斗争才开始。

由此，我们可见为何多党竞争未必适合发展中国家了：因为尚未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尚未完全个体化，仍受部落、族群的限制；所形成的政党，多数也不过是前现代共同体的外壳罢了。

四、关注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方面关注的领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关注的领域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呈现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是一种价值取向，而是一种事实，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时需要承认并正视的。

第二讲 二战后的第三世界

2025.3.13 / 2025.3.20

一、第三世界的独立发展道路及其挫折

（一）独立早期领导人的“中间道路”取向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以恩克鲁玛、纳赛尔、苏加诺、尼赫鲁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取向是反抗殖民者，获得政治独立；加快发展，建立强大的新国家；没有特别模仿美苏任何一方的道路，而是走独立的“中间道路”，从而给自己更大的斡旋空间。当然，虽然没有刻意模仿，但苏联发展道路对它们的影响很大，这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第一，它们反抗殖民者而独立，当时的殖民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与苏联对抗，因而独立后就自然有靠近苏联的倾向；第二，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国家，苏联是当时罕见的可借鉴经验的案例。因此，尽管他们未必想要发展社会主义，但这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大多是偏左翼的。

（二）“中间道路”的三种结局

随着冷战的发展，“中间道路”迎来了三种结局。第一种是（声称）朝“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但在之后大多失败。第二种是转向西方式的发展路径，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造成了传统社会无法承受的代价，又或者是将土地或产业激进地收归国有后经营不佳，当然在不少情况中也有美国干涉的成分。第三种是继续维持“中间道路”，如印度。

（三）第三世界的合作受挫

在独立之后，第三世界内部一度提出要合作，并采取了一些相应举措；但是，第三世界的合作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甚至有一些合作是失败的。从政治上而言，第三世界国家分处不同的历史和政治经纬，政治合作有较大的难度，即使是“不结盟运动”在冷战后也逐渐失去了政治价值。从经济上而言，首先，发展中国家多是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国，是工业品的进口国，因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互补性很小，这一情况直到中国崛起才有所改变；其次，国际金融机构由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此外，易货贸易的模式虽然能缓解硬通货问题，但也制约了经贸合作。

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变化

（一）“民主化”

1. 军人政权退出历史舞台

在军人政权集中的拉美与非洲，自80年代初起，多数军人政权开始和平地“还政于文人”。

在拉美，1980年，秘鲁恢复民选政府。1982年马岛战争失败后，阿根廷军政府倒台；1983年阿方辛民选政府上台。1983年，玻利维亚恢复民选政府。1984年，乌拉圭军政府“还政于文人”。1985年，巴西军政府终结。1989年，智利选举，基民党人获胜，次年恢复代议制政府；1998年皮诺切特交出军权，彻底完成民主过渡。1993年，巴拉圭经历30多年军政府统治后，重回文人政府。

在非洲，1998年，尼日利亚军政府还政于文人。

2. 一党制政权为多党制取代

在拉美，1990年，尼加拉瓜反对派联盟选举获胜，结束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11年的执政；2000年，墨西哥反对党选举获胜，结束了革命制度党71年连续执政。

在非洲，贝宁、刚果（布）、加蓬、喀麦隆于1990年实行多党制；赞比亚于1990年恢复多党制；肯尼亚于1991年恢复多党制；加纳于1992年实行多党制；坦桑尼亚于1995年开始进行多党选举。在埃塞俄比亚，1991年推翻门格斯图政权，1995年进行多党选举。1992年，莫桑比克结束内战，实行多党制。2005年，乌干达实行多党制。至1989年，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一党制或无党制，9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或恢复了多党制。

（二）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权

1989年，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出任南非总统，取消对黑人解放组织禁令，释放纳尔逊·曼德拉。1994年，南非举行了不分种族的大选，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联盟三方联盟获胜，曼德拉出任总统。

（三）也门统一与动乱

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南方社会党武装力量失败；萨利赫任总统，1999年、2006年两次连任。2011年，也门反政府力量要求萨利赫下台；11月，萨利赫移交权力，出国。2014年起，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冲突。

（四）索马里和卢旺达

1. 索马里军阀混战

1991年，索马里巴雷政权被推翻，随即陷入内战。1992年，美国主导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1994年，美军在遭到激烈抵抗后撤出；索马里持续军阀混战；军阀与伊斯兰法院联盟交战。2012年11月，索马里成立内战以来首个获得承认的政府，但反政府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仍在活动。

2. 卢旺达

卢旺达于1991年实行多党制。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种族屠杀。1994年，爱国阵线（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人组成）建立新政权，实行了和解政策，卢旺达开始稳定。2003年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2015年通过修正案。

（五）南苏丹独立

苏丹的南北部分在宗教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北部多为伊斯兰教，南部多为原始宗教及基督教。南苏丹受英国支持，寻求独立；苏丹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2年持续内战，战争的结果是南苏丹自治地位。在南苏丹发现石油后，由于利益争夺的白热化，苏丹政府希望将南苏丹自治地位取消，于是从1983年到2005年1月发生了第二次内战。2005年1月9日，内战双方签订《全面和平协议》：6年过渡期后，南部全民公决是否独立。2011年，南苏丹经全民公决独立。

三、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变化

（一）经济起伏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世界经历着经济结构调整。这场以自由化为主要特点的调整，主要的举措包括针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而私有化的目的是市场化，市场化又以自由化为前提，这是因为市场化迫切需要自由化提供不受干扰的市场信号。自由化，即经济自由流通，包含两方面：一是商品（经常项目与服务）的自由流通，二是资本的自由流通。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指出，私有企业面临着“硬约束”，只要赚取不到利润就面临着破产倒闭；国有企业则面临着“软约束”，即使经营不善也有政府兜底；因此，私有企业对市场信号要敏感得多。当然，这一理论未必完备，例如在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中，一些私有大企业也得到了政府的帮助。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私有化、自由化的最终目的都是市场化；但是，在这段时期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实践中，却本末倒置了，私有化、自由化从条件（手段）成为了目的。

因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自由化改革；为了借取外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来自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自由化改革。自由化改革使得发展中世界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遭遇了经济困难。

90年代中期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恢复增长。21世纪头十年，经济恢复增长，一些国家增长速度较快；这些增长的原因是，经过了经济低谷的“大浪淘沙”后，留下的企业多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此外，21世纪初能源、原材料价格飞涨，以此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恢复之前的速度；新冠疫情更使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

（二）国际经济问题

1. 国际经济新现象

冷战期间，以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是，随着自由化改革的进行，这种呼声也逐渐式微。冷战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经济发展成果。

20世纪70年代，7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组成了七国集团（G7），后来又形成了“G7+”模式，即邀请发展中国家参与对世界经济与发展问题的讨论；金融危机后，G7显然已无力处理世界经济问题，因此推动了20国集团（G20）的形成。G20原来是G7加上其挑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而召开的部长级会议，是一个沟通平台；因为金融危机波及的范围大、影响深，所以在2008年，G20升级为首脑级会议，并于次年成为了讨论全球问题的平台，也是事实上协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平台。新冠疫情后，随着欧美政治经济政策调整，G20是否还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有待观察。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希望将WTO“扔在一边”。2006年，WTO多哈回合谈判无限期中止，标志着WTO的自由贸易努力遭受重大挫折。金融危机后，美国发起了一些新的国际贸易协定与组织，旨在边缘化WTO。但是，WTO在发展中世界依然重要，发展中国家也在WTO中越来越占优势。

2. 南北关系中的问题

冷战期间，南北关系的问题就已存在；冷战之后，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有所提升，但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冷战后，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姿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就从中游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是，跨国公司拿走了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利润的绝大部分，其投资并未对发展中国家起到想象中那么大的作用；甚至，有一些跨国公司从事投机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大搞金融、房地产，其收益更难留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贸易条件也鲜有实质性改观。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大国，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依然难以竞争过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因为发达国家有着高额的农业补贴，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没有价格优势。

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资本是一个关键，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储备中处于弱势。发展中国家缺少制造高附加值工业品的能力，农业产品又竞争不过，因而缺乏硬通货。

总之，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硬性的约束。怎样创造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的问题，从二战后就已存在，至今也仍未过时。

第三讲 阿根廷

2025.3.20 / 2025.4.3

一、阿根廷概况

阿根廷共和国是一个位于南美洲的国家，面积278万平方公里，人口4604万（2022），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308万（2020）。人口中欧洲人和印第安-欧洲混血占95%，主要为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后裔；77%信奉天主教，9%信奉新教。

阿根廷有着优越的畜牧业发展条件，其自然资源也较为丰富，但这并未给阿根廷带来持久的繁荣。整个20世纪，阿根廷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从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发展中国家。

二、阿根廷历史

（一）殖民者与考迪罗

16世纪中叶，西班牙逐渐在今阿根廷地域建立殖民地；1776年建立拉普拉塔总督区。1816年，殖民地宣布独立，建立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后陷入动荡，考迪罗之间互相攻伐。

在谈及南美近现代的发展进程时，绕不过的一个概念是“考迪罗”。考迪罗是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量的财富，同时拥有自己的武装，还拥有众多在其地产上工作的人口——可见，考迪罗所掌握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联合体。讲师认为，考迪罗与中国东汉末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土地主（诸侯、军阀）类似。

1853年，随着动荡逐渐平息，阿根廷制定宪法，确立了联邦制，经过几次修改，至今仍有效；这也为阿根廷地方力量较强的情况奠定了基础。1880年起，大量欧洲移民来到阿根廷，阿根廷政治经济进入稳定时期，由国家自治党（PAN）长期一党执政；国家自治党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是一个代表考迪罗利益的统治团体。1912年颁布新选举法，给予年满18岁男性公民选举权；这标志着由国家自治党这一考迪罗统治团体独揽大权的时代即将过去。

（二）现代政党体制与军政府

1916年，激进党赢得选举；激进党即激进公民联盟，其主要代表中产阶级利益。1930年，军事政变推翻激进党政权。1945年，胡安·庇隆组建正义党，次年当选总统；庇隆是现代阿根廷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执政导致了阿根廷“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出现，前者支持维护劳工权益、扩大社会福利，后者则反对这些主张。庇隆掌权至1955年被军事政变推翻；随后军人文人交替执政，但排斥了正义党。1973年，在民众运动压力下，正义党重新参选获胜，庇隆结束流亡回国任总统；1974年去世，其妻伊莎贝拉继任，1976年被军人政变推翻。

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被军政府统治，迫害镇压左翼反对派。1982年，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战败；12月，十万人游行，军政府倒台；激进党阿方辛于1983年当选总统，结束军政府时代。1989年，正义党梅内姆当选总统，开启了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为1999年至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埋下伏笔。1999年，激进党德鲁阿当选总统；2001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辞职，经动荡后，正义党杜阿尔德任总统。2003年后，正义党左翼的基什内尔夫妇相继当选总统。

2015年至2019年，中右翼联盟马克里任总统。2019年，左翼的全民阵线的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2023年12月，极右翼“自由前进运动”米莱就任总统，其社会经济政策极端，裁撤大量社会福利支出。目前，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为正义党等中左政党组成的“团结为祖国”。

纵观现代阿根廷历史，虽然有数次军政府政变，但其政局总体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内战或局部分裂。

三、阿根廷基本政治制度

阿根廷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23个省和1个联邦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组成。

阿根廷实行两院制。参议院72席，全国24个省区各3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参议长由副总统兼任。众议院257席，由各省区按人口比例分配；众议员任期4年，每两年改选1/2；均由直选产生，可连选连任。

阿根廷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武装部队统帅，直选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一次。

四、阿根廷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走入下滑通道

在19世纪90年代，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与德国、比利时相近，高于澳大利亚、瑞典、瑞士、挪威等国。而在2001年，阿根廷有了1400万贫困人口，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其中赤贫人口550万。因此，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阿根廷为何在20世纪从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变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

首先，我们考察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阿根廷经济繁荣的原因。当时，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地广人稀的人口情况，阿根廷的种植业、畜牧业发达，农产品大量出口。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科技革命、欧洲和平的最繁荣的时期，市场一片欣欣向荣，阿根廷通过向英国、欧洲的发达国家出口，换取了大量工业品。

一战后，阿根廷被迫进行进口替代。庇隆上台后，推行庇隆主义经济政策：国有化、继续进口替代、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军政府基本延续了庇隆时期的经济政策。

80年代以后，阿根廷开始自由化改革，但并未解决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与同时期的其他自由化改革一样，阿根廷的自由化也是以私有化为基础的。由此就造成了诸多问题：储蓄率低，国内资本形成能力差，增长严重依赖外资；固定汇率和金融自由化导致本币币值高估，外来投机资金大量流入；对外贸易失衡，进口大大高于出口，逆差导致高额外债；私有化加剧了失业率、拉大贫富差距。

可见，以阿根廷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在推行自由化的过程中都忽视了，国际市场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而是有着各类结构性障碍（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的市场。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变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分量越来越高，而发展中国家依靠可变资本（如劳动力）的利润率持续走低，这对第二产业的资产所有者而言是致命的。由此，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所有者就会投向第三产业（如金融），但金融资本的涌入又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2000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阿根廷经济在整个20世纪的积累几乎化为乌有。基什内尔夫妇任期内，借助世界范围内初级产品价格上升的一波趋势，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开始缓和。但是，阿根廷经济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出口问题。当前，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占50%以上，大豆为主要出口品；由过去的农业大地主形成的跨国金融集团成为了阿根廷财政的重要来源，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阿根廷的财政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掌握在国际垄断粮商手中。与此同时，阿根廷大多数人口为城市人口，但城市产业却无法满足这些人口的需求，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口与贫民窟。时至今日，阿根廷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二）是否形成了稳定的政治

阿根廷并未形成稳定的政治，剧烈的“左右摇摆”是其表现。阿根廷政治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几种分裂。

1. 社会分裂

阿根廷的阶级和阶层可以分为三个：农牧业农场主和具有跨国联系的大资本家、中小企业主和城市资产阶级、劳工。其中，中小企业主和城市资产阶级从一战后进口替代时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执政的激进党也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劳工阶层是在二战后影响力变大的。

阶层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农牧业寡头与一般资产阶级的对立，前者对阿根廷本土工业的发展没有兴趣，乃至于压制后者；激进党上台后，一般资产阶级获益；直至1930年农牧业寡头支持的政变推翻了激进党统治。这一时期的另一组对立是农牧业寡头与劳工的对立——一战后，为了执行进口替代，农牧业寡头与一般资产阶级有时也会妥协，共同压制劳工阶层。

20世纪下半叶，主要的阶层对立变为了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对立。前者以社会福利、管制资本进出、国有化为特点，后者以节约开支、严格财政纪律、削减福利、自由化、放松资本管制为特点。

2. 政党分裂

阶层分裂与政党分裂相联系。虽然阿根廷历史上的国家自治党代表了农牧业寡头的利益，但其实农牧业寡头是不需要一个政党来代表自己的，因为不论是什么政党上台，都无法离开它们的财政支持。由此，阿根廷的政党分裂主要是激进党与正义党的分裂：激进党主要代表工业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正义党代表和利用劳工。这样一来，阿根廷虽然看似是一个“两党制”国家，但其实是一个“变形的两党制”——农牧业寡头集团是“房间里的大象”，而这在发达国家中往往是不存在的。

此外，这两个政党内部结构松散、派别林立。我们知道，考迪罗的妥协带来了联邦制的阿根廷，导致阿根廷建国后地方势力仍很强，这也就延续到了政党政治中。每一个阿根廷政党的省级组织都同时面临着党的中央组织与同级的其他省级组织；按照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传统，地方的党组织是要服从中央的党组织的；但在阿根廷，地方党组织首先考虑的往往是省组织周边的利益，而非服从中央。这一问题，不论是激进党还是正义党都没能解决。于是，阿根廷的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都主要是上述两党分裂组合形成的（现执政党除外）。

阿根廷政党的上述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庇护主义。在正义党执政时期，劳工背后有着工会；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进口替代战略基本失败、失业人口大量出现后，失业人口无法在正规企业中工作，也自然无法加入工会，因而他们选择加入了另一种组织——贫民窟中的黑社会。这样一来，阿根廷的基层政治就受这些黑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影响，政党动员选民不靠自己，而靠地方的“老大”，这也就是所谓的“庇护主义”。

由此可见，阿根廷的政党更多地只是一个选举的平台，而非一个完善的治理国家的政治组织。

阿根廷政党的如上态势导致了民粹主义。讲师认为，民粹主义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迎合民众，而非引领民众；民粹主义表面上是反精英的，但实际上却很容易出现精英统治。民粹主义政党追求着选民的选票，没有像一个现代政党那样忠于自己的党纲，更没有像一个列宁式政党那样成为人民的先锋队。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全盘迎合民众可能导致无法顾及长远利益，从而使问题的根本恶化。以正义党（“第三道路，民族主义，正义主义”）为代表的阿根廷的偏左政党就有突出的民粹主义特征。

（三）军队的角色

军队在阿根廷20世纪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首先，这是因为考迪罗传统，旧阶层（农牧业寡头）与军队有密切关系。其次，军队拥有暴力、有组织，工会、黑社会的组织性都比不上军队；在政治分裂状态下，只有军队能代表国家。

第四讲 南非

2025.4.10 / 2025.4.17

一、南非概况

南非是一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国家，面积122万平方公里，行政首都为比勒陀利亚（Pretoria），立法首都为开普敦（Cape Town），司法首都为布隆方丹（Bloemfontein）。

南非人口为6200万（2022年），其中黑人占80.7%，包括祖鲁等9个部族；白人占7.8%，包括阿非利卡人（Afrikaner，布尔人/荷裔白人）和英裔白人；亚裔占2.5%，主要是印度人。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为通用语言。约80%的人口信仰基督教。

二、南非历史

（一）殖民者与种族隔离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建立中转站，荷兰人随之殖民，征服土著，发展农业。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人占领好望角，随后在纳塔尔省（Natal）建立殖民地；布尔人（荷裔白人为主）被英国人压制，长途跋涉到内陆，建立德兰士瓦共和国（Transvaal）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

1899年至1902年，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爆发了英布战争；布尔人战败后，英国人统治南非。1910年，由于维护在南非的统治的成本过高，英国人撤离，四个白人省组成南非联邦，由布尔人（阿非利卡人）控制政权。当时的阿非利卡人中，存在希望与英国缓和的温和派，也存在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1948年，阿非利卡人组成南非国民党，其主要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立场，赢得了只有白人参加的大选，通过立法建立种族隔离政权（apartheid）：南非分为四个白人邦（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奥兰治）和十个黑人家园，其中前者构成了南非联邦，后者不属于南非联邦，因此占当时南非人口多数的黑人没有南非联邦的公民权。黑人家园的范围由白人划定，散落在南非各地，多为土地贫瘠的地域；黑人家园有自己的统治机构和军队。

（二）非国大与黑人解放

在白人建立种族隔离政权的同时，非洲土著人也发起了争取解放的运动。1912年，非洲土著人大会成立；1923年，改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洲大陆历史最悠久的解放组织。1955年，非国大通过《自由宪章》，认为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黑人和白人，都应该有土地权、选举权等。1960年，非国大被南非白人政府宣布为非法；后来建立军事组织“民族之矛”。

20世纪70年代起，受到国际压力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开始松动。1979年，白人政府承认正式存在的黑人工会合法。1986年，取消控制人口流动的规定。1989年，非国大制定民主南非制宪准则。1990年2月，德克勒克政府宣布无条件废除对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等组织的禁令，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建立新南非的进程开始了。

1991年，废除《土著土地法》《集团住区法》《人口登记法》三大种族隔离法律；当年年底，开始多党制宪谈判。1993年11月，通过《过渡宪法法案》；1994年4月据此举行不分种族大选，非国大、南非共、南非非洲工会大会三方组成的联盟获得63%选票，曼德拉出任总统。

1996年，南非制定新宪法，确定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全国分为9个省；议会分为国民议会和省务院，省务院相当于上院；总统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建立统一的军队。1995年，根据《民族团结与和解法》，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种族隔离政权时期的问题；21世纪初，这一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南非通过和解而非清算的路径完成了对过往问题的回答。

三、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与维持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非常特殊的。在英国人撤出南非、阿非利卡人掌握政权后，阿非利卡人就着手制定种族隔离制度。1911年《矿山工种保留法》禁止黑人从事矿业的技术工种；1913年《土著土地法》禁止黑人在保留地以外拥有土地；1950年《集团住区法》强制所有种族都生活在按种族分类的区域内——主要针对有色人种和印度人。

（一）建立种族隔离制度的动因

英国殖民者的军事实力与技术能力均高于阿非利卡人。19世纪后期，南非的英国人与阿非利卡人发生矛盾。阿非利卡人在南非主要从事农业，英国殖民者到来后则重视矿业——矿业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产业，以中小农场主为主的阿非利卡人无法自行发展。英国人开始在南非建设工业，而这就需要土地，因此英国人与阿非利卡人在土地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许多阿非利卡农场主破产，多数阿非利卡人成为了小农场主或英国人工厂的雇佣工人；但是，即使是小农场主和雇佣工人，阿非利卡人也面临着严峻的竞争——来自数量庞大的黑人的竞争。当时在南非已经产生了一个黑人农场主阶层，英国人利用着他们；在雇佣工人方面，雇佣阿非利卡人的成本也比雇佣黑人的成本要高。

布尔战争证明，阿非利卡人无法在军事上战胜英国人。但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历史节点上，基于欧洲殖民者控制世界的背景，以及英国人节约统治成本的考虑，英国人还是与阿非利卡人达成了妥协——政权被交给阿非利卡人，英国则保持对南非现代经济的控制。这样，阿非利卡人与英国人的矛盾告一段落，阿非利卡人转而积极维护自身与英国人的利益；而此时阿非利卡人唯一的威胁就来自黑人了。

1911年的《矿山工种保留法》排除了黑人在当时南非兴盛的矿业作为技术工人工作的权利，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则瓦解了黑人土地所有者阶层，一个潜在的黑人资产阶级被扼杀了。可见，种族隔离建立的最重要的动因就是排除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二）种族隔离制度维持的原因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在世界民族民主运动迭起的1948年正式完成建立，但在此之后依旧维持了四十多年，这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

南非有特殊的经济状况。英国殖民者为南非建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南非的劳动力（非技术工作）也相对便宜；因此，在现代工业的非技术工种以及农业中，广泛存在着便宜的劳动力。与之相对的，唯有白人可以担任的技术工作则薪酬虚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非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

冷战的背景。在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压力的情况下，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依然能维持，冷战背景“功不可没”。20世纪70年代，葡萄牙在南部非洲的殖民统治开始崩溃，由于南部非洲有大量矿产资源与战略资源，苏联大规模介入南部非洲。为了遏制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扩张，美国意图扶植南非，在许多国际事务上为南非“开绿灯”。

四、新南非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一）经济状况不佳

总的来说，新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乏力：1994年政权建立后，GDP下降；2002年和1990年的数值相近；21世纪00年代，随着原材料价格飞涨，南非GDP迎来了一波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南非的GDP总体下降。

南非失业率高企，在1994年以后基本保持在30%左右；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年轻人失业率，15~24岁人群的失业率约为50%。外部投资方面，南非从2008年至2017年，FDI从760亿兰特降到176亿兰特，到2023年仅有53亿美元。信用方面，大多信贷评级机构将其定为BB或BB-级，说明其缺少投资价值。

南非出口产品单一，储蓄率低，通胀压力大，贫富差距大。2019年，仅有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业为正增长，有着很大的泡沫；目前，第三产业GDP占比接近75%。第三产业GDP占比高是许多经济存在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GDP占比高是因为其控制了许多影响世界经济运行的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也多为高技术产业，重质量不重数量；而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却主要是外资，缺乏生产性的服务业，多为投机性的第三产业，造成了巨大的泡沫。

南非的艾滋病问题严重。2018年，15~49岁人口中艾滋病毒携带率为20.4%；同期撒哈拉以南非洲为3.9%。

（二）经济问题的根源

南非经济问题的根源可被总结为三方面：

1. 新南非的建立基于经济妥协。我们知道，新南非的建立、种族隔离的废除是和平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迫于国内外巨大压力，选择与以非国大为首的黑人的妥协；这次妥协与上次与英国人的妥协相近：政权交给黑人，但要“保障白人的经济地位”。由此，在新南非中，原来的大土地、大矿山所有者（多为英裔白人）的利益依然存在，这些南非经济中效益最好的部门无法服务于南非的财政。
2. 曼德拉、姆贝基时代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再分配，其对象显然不能是白人资产阶级的产业，因此只能是原来的国有资产，这就带来了私有化浪潮。以非国大为代表的掌权黑人在此过程中占有优势，分配走了优质产业与土地。剩下的低价值、不稳定的产业（尤其是低端的第三产业）没有竞争力，纷纷破产，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形成了白人（阿非利卡人）赤贫者群体。
3. 兑现非国大对支持群体的承诺。为了提高黑人的经济地位，新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客观上也使一小部分黑人进入了中等收入阶层。但其问题在于，一批黑人在经济再分配的过程中“暴富”，尤其是非国大的一些头面人物，这反映了非国大的腐败倾向；出现这样的黑人富豪阶层，符合原有白人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黑人富豪阶层将竭力维护白人大资产所有者和印度富豪的利益。

（三）土地问题

2018年，拉马福萨总统宣布要对一些土地无偿征收；2025年1月，签署《征收法案》。但需要注意的是，《征收法案》并非对所有土地无偿征收；该法案对可以无偿征收的土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将大多数土地排除在外。

该法案的出台有政治目的与经济目的。土地问题是南非黑人诉求的核心问题（追溯到1913年《土著土地法》），非国大必须回应。1994年，新南非通过《土地权利追诉法》，但重新分配土地的方式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是极其有限的，要么依照上述法律进行（进展十分缓慢），要么由政府购买土地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滋生腐败）。到2013年，8%的白人仍然占有72%的土地；2016年，只有9%的土地重新分配，离政府30%的目标很远。21世纪以来，非国大支持率总体下跌，为了安抚其票仓，非国大将土地征收再次提上了日程。

（四）政治问题

自1994年新南非首次大选以来，非国大就持续执政；当然，其执政不是一党执政，而是依赖三方联盟（至2023年）或政党联盟（2024年起）。

非国大面临着执政党分裂问题。2008年，姆贝基派和祖马派决裂，祖马支持者在2023年建立“民族之矛”党。2012年后，非国大激进派建立经济自由斗士党。2014年，全国金属制造业工会宣布不再以组织名义为非国大竞选。南非共产党虽然是三方联盟的一员，但也经常批评非国大政策。虽然已经分裂出两个政党，但非国大内部也依然派系众多，难以团结。

2016年地方选举，非国大支持率降到最低，失掉了在几个大城市的执政权。2019年大选，非国大得票率57.5%。2024年大选，非国大得票率40.18%，首次未过半数，与民主联盟、因卡塔自由党组建民族团结政府——民主联盟、因卡塔自由党都是南非的反对党，但其与非国大结成执政联盟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经济自由斗士崛起。。

目前，南非的主要反对党包括：

* **民主联盟：**在西开普敦省、比勒陀利亚等几个大城市执政，从主要是白人政党向跨族群政党转变；
* **经济自由斗士：**从非国大分裂，较为激进；
* **民族之矛党：**从非国大分裂；
* **因卡塔自由党：**祖鲁人的政党，代表其部族利益。

现在，南非的问题不再是种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中，都有贫富之分。种族隔离的旧南非不过是利用了冷战时期的特殊国际背景，出色地发展了经济；冷战结束后，南非的经济并非是因为黑人统治而衰落的，而是因为国际背景的更迭而走了下坡路。

第五讲 尼日利亚

2025.4.17 / 2025.4.24

一、尼日利亚概况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是一个位于西非的国家，首都阿布贾。领土面积92万平方公里，人口2.27亿（2024年），是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有250多个族群，一半人口信伊斯兰教（多在北部），近一半信基督教（多在沿海地区）。

二、尼日利亚历史

15~16世纪，欧洲人来到尼日利亚，从事奴隶贸易；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逐渐控制了尼日利亚大部分地区。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建立议会制共和国。

1966年，尼日利亚发生两场军事政变，东部地区宣布成立比夫拉共和国；1967年至1970年，尼日利亚处于内战；内战结束后，实现了和解。70年代，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很快。1979年，军政府还政于民；起草新宪法，建立总统制共和国。1983年，再次发生军事政变；1998年，再次还政于民。

1999年开始进行总统选举，政局比较稳定。但是尼日利亚的安全形势严峻，南部产油区动荡（石油开采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当地民众利益，加之东部独立的历史），北部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制造恐怖袭击，被尼政府定为恐怖组织。尼日利亚现有宪法1999年颁布，在1979年宪法基础上修订，规定尼日利亚为总统制国家，国民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实行联邦制。

三、尼日利亚经济

尼日利亚已探明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十一、非洲第二位；已探明天然气储量居非洲第一位；是西非唯一产煤国。尼日利亚经济支柱为原油出口，政府财政收入40%左右来自石油；国内炼油和石油加工能力低，85%成品油消费来自进口。基础设施、工业落后，电力缺口很大，约40%的地区没有电力供应，其余地区的供电也不稳定。尼日利亚人口的七成为农业人口，但农业极其落后，粮食依然需要大量进口，出口作物以木薯为主。尼日利亚在第三产业方面影视产业较为发达，是西非的电影中心。

尼日利亚GDP为3900亿现价美元（2023），是非洲排名前列的经济体。尼日利亚贫困人口1.33亿（2022），预期寿命54岁（2023）。

四、尼日利亚的相关问题

（一）殖民统治对尼日利亚独立后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非洲的历史上，尼日利亚不是一个原生的国家，而是被殖民者“捏合”起来的国家。因此，尼日利亚在独立后的发展，就首先与殖民统治相关，殖民统治的策略决定了尼日利亚政治社会的状态，以及民众对殖民者的态度。英国的殖民统治策略是相对温和的间接统治，采用这种策略与其殖民尼日利亚的目标有关系：19世纪后期，列强在非洲进行殖民争夺，英国统治尼日利亚的目的在于排挤其他国家的争夺，而非建立强有力的统治；这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截然不同的。

英国的间接统治需要利用地方势力，从而强化了各个地区政治、宗教和经济分裂。北部以豪萨-富拉尼族为主要民族，由伊斯兰教长老统治，反对欧式教育，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少；西部以约鲁巴族为主要民族，为基督教地区，与欧洲联系密切，初级工业集中；东部以伊博族为主要民族，同为基督教地区，是产油区，与外部有经济联系。这三个地区原本毫不相干，直到殖民者到来才开始发生联系，但这种联系既不密切，也不有机，其分裂依然存在，甚至强化了；因而，在20世纪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英国统治没有激起全国性的、团结一致的、强大的反殖民化运动，尼日利亚的反殖民主义者分散在各地区。

可见，虽然英国温和的间接统治对尼日利亚造成的伤害较小，但也造成了尼日利亚在独立后缺乏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为尼日利亚之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二）尼日利亚以族群为代表的前现代集团间关系的影响

尼日利亚的本土政治、文化较为落后。北方伊斯兰教地区虽然经济落后，但政治组织化程度高于南方；约鲁巴族甚至没有书面文字。

20世纪中叶，一些殖民国家开启了非殖民化运动，英国也在此列。1960年，尼日利亚在英国推动下独立。尼日利亚独立后，迅速陷入了国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当时尼日利亚的首都是西部约鲁巴族的拉各斯，掌权者也是约鲁巴人，他们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但是，约鲁巴族的人口及控制的地区是较少的，因此这种统治并不稳固；再加上许多约鲁巴人的行政能力不足，就导致北方豪萨-富拉尼族进入政府与军队的要职。于是，约鲁巴族与豪萨-富拉尼族就形成了政治同盟。

北方与西方站在了一起，东方的伊博族就感受到了威胁。当时，伊博族的地位是最低的，例如在军队中伊博人越来越受到豪萨-富拉尼人的排挤。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伊博人下级军官发动不流血政变，企图从豪萨-富拉尼族手中夺回对军队的掌控力，这场政变引起了北方人的强烈不满。不久后，豪萨-富拉尼军官也发动了针对伊博族军官和高级将领的政变，大量伊博族军官被杀，激化了尼日利亚的族群矛盾，导致了尼日利亚内战。

内战以伊博人的战败告终。虽然内战后东部的一些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但已无法兴风作浪。内战后军政府时期，北方人的主导地位加强，试图建立北方人占优势的具有中央权威的国家。

（三）尼日利亚为何没有分裂

我们已经提到，尼日利亚是一个“捏造”起来的国家，其内部族群之间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那尼日利亚为何还没有分裂？

首先，历史记忆的缺乏可能也有积极作用——尼日利亚的族群、宗教团体之间历史上并没有严重的敌对。其次，第一共和国瓦解后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全国性权力中心，即北方豪萨人和西部约鲁巴人的联盟，豪萨人的政治传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以尼日利亚迁都阿布贾为表现。最后，军政府时期也有一定的成就：基本形成中央占优势的国家，重划行政区，使零碎的州和地方政府无力与中央对抗；制定了1979年宪法，尽力在照顾宗教、族群、地方特征前提下构筑统一国家；最大限度地普及了小学教育。

（四）尼日利亚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什么没有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

尼日利亚富有石油、天然气等重要战略资源，但并没有支撑起经济的持续发展。要考察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关注其背景，即殖民时代的经济遗留。殖民时期的尼日利亚发展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由于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石油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所以尼日利亚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产地和工业品市场。后来，殖民地政府出于财政需要，设置较高的进口税，导致进口工业品价格上涨，部分工业品被迫在尼日利亚本土生产，客观上带来了掌握在外资手里、一定程度的进口替代。

石油资源开采之所以没有为尼日利亚经济带来良性刺激与支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油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由于缺乏产业规划，石油开采产业挤占了对农业和其他第二产业的投资；70年代，带来了巨大收益的石油产业催生了非生产性项目（城市广场、体育馆等“面子工程”）的建设；严重破坏了环境也威胁到石油产区人口的生存。此外，尼日利亚的石油开采严重依赖外资和外国市场，国际油价的涨跌高度影响尼日利亚的经济。

族群间关系也对经济有影响。工业规划受到族群、地方竞争的影响，碎片化的地方阻碍了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

尼日利亚国内资本形成能力不足、技术落后。尼日利亚仅有的工业也严重依赖外资、外国专业技术人员，民族资本能力不足。尼日利亚制造业则有“低附加值外汇密集工业化”的特征。国家没有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总而言之，尼日利亚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特征：农业落后、工业化程度低、财政依赖资源型产品、基础设施落后、贫困率高——经济发展的阻力很大。尼日利亚在族群、地区矛盾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但很多隐患没有消除。特殊的是，在尼日利亚（尤其是沿海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地区），西方式选举政治有比较好的土壤。

第六讲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2025.5.8 / 2025.5.15

一、沙特阿拉伯

（一）沙特阿拉伯概况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西亚国家，面积225万平方公里；人口3200万；伊斯兰教为国教，逊尼派占85%，什叶派占15%。

阿拉伯帝国衰落后，西亚在16世纪被奥斯曼帝国统治。18世纪，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创始人瓦哈卜与阿拉伯半岛部落酋长沙特结盟，开创第一沙特王国（1745~1818）。1812至1818年，第一沙特王国与奥斯曼藩属埃及爆发了阿里战争，第一沙特王国覆灭。1824年，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建立第二沙特王国。19世纪60年代后，第二沙特王国面对着内忧外患，于1892年灭亡。20世纪初，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复国，1925年兼并汉志，1932年9月23日正式定国名“沙特阿拉伯王国”。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过去由国王兼首相，王储兼副首相；现王储兼首相。沙特阿拉伯禁止政党活动，没有宪法，1992年前仅由1926年颁布的《汉志王国约法》规定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组成；国王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加强了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如美国对阿富汗宗教势力的支持也离不开沙特的宗教力量。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伊拉克的强大军事力量令沙特亟需安全保护，遂邀请美国在沙特驻军，建立军事基地，沙特从此开始直接受到美国的影响。受此影响，一方面，沙特国内的自由派（以商人为主）开始要求世俗化；另一方面，在沙特的美国人的作风也激起了沙特国内的极端保守派（如瓦哈比派宗教人士）的反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92年，沙特颁布政府基本法、协商会议法和省组织法，这是自由派与保守派妥协的产物。依据协商会议法，1993年建立沙特协商会议作为政治咨询机构：由主席和150名委员组成，由国王任命，任期4年，可连任；下设12个专门委员会。沙特的司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执法依据。

（二）沙特经济与社会情况

20世纪50年代之前，沙特属于前现代的游牧经济和绿洲农业。50年代之后，尤其是70年代后，由于产油国纷纷将石油产业国有化，以第四次中东战争为契机组成OPEC、实行石油禁运，加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亟需找到新的“锚”，沙特开始依靠石油及其制品迅速发展。

沙特城市化率方面，1950年为16%，2004年为88%。2022年，GDP为1.11万亿现价美元，增长8.7%；2023年增长0.03%，石油收入创新高，占收入比重同比下降14%，为63%；2024年增长1.3%，非石油活动增长更快。近年来，新能源的蓬勃发展促使沙特有意识地将经济结构转向非石油部门。

沙特原油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二位，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六位；工业以石油和石化工业为主，石油及其产品出口占90%。沙特农业已经转变为现代化农业，谷物自给率低。沙特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40（2022），其中预期寿命77岁（2021）。

（三）现代沙特国家的特征

1. 政治统治者与瓦哈比派的联盟是沙特的立国之本

瓦哈比派最初利用沙特家族的势力扩大教派影响；沙特家族依赖瓦哈比派确立建立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统治合法性。政治统治集团与宗教集团之间的合作亲密无间，至今亦是如此；这也意味着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而非现代的。

现代沙特建国后，乌里玛管辖宗教、司法问题，一般不干预世俗政治，是国家与信众之间的桥梁。在沙特政教关系中，政治处于更中心的位置，世俗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在现代沙特越来越大，乌里玛则逐渐官僚化，成为了类似政府雇员的存在。

由此可见，虽然从其立国之本而言，沙特可谓“政教合一”；但从实际运作来看，宗教势力并未干预政治势力，反而是政治权力限制了宗教权力，因此其是否为“政教合一”，还有待商榷。

2. 在部落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国家

沙特家族依靠部落和部落联盟赋予的权力取得统治地位；依靠本部落打压敌对部落，在超越血缘的地域内确立统治。但是，部落的分而治之对国家而言是危险的；因此，国家财力增长后，沙特家族给予部落酋长和部落民好处，同时绕开部落直接面对部落民。从游牧部落生活进入定居生活、城市生活的部落民开始形成对国家的效忠；由此，现代沙特的部落政治的总的趋势是部落影响下降，趋于解体。

（四）沙特政治面临的问题

当代沙特政治面临的问题，基本上由这一个问题衍生：前现代式的政治制度如何与现代的经济、教育再生产出的社会结构相适应？

家族垄断政治与国民政治参与的矛盾。沙特的君主制不是君主立宪制，沙特君主是实权君主。其中涉及一个问题，即沙特君主的继承制度。在现任王储之前，沙特君主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目前所有的沙特国王都是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的儿子；现任王储则是现任国王的儿子，从这一点看，沙特君主继承制有变为父死子继的可能性。当然，这一矛盾并非是目前最突出的矛盾。

国家的统治者将来自于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的儿子们及其后裔。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他们当中最睿智者接受效忠，治理国家。

——1992年《政府基本法》第5条

现代社会经济要求与伊斯兰教法的矛盾。在90年代全球化飞速发展后，这一矛盾日益突出。

全球政治环境、外来压力与保守的伊斯兰政教传统的矛盾。由于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都在沙特境内，因此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角色与“教宗国”有一定相似之处，沙特的伊斯兰教也从而比较温和与包容。但是，沙特官方温和保守的伊斯兰教也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伊斯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前者希望在沙特建立君主立宪制，后者则类似于90年代的塔利班。面对挑战，沙特对伊斯兰自由主义作出了立法的妥协；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则采取了联合宗教力量、推行更加保守的政策的做法，其目的是把握住伊斯兰世界的保守化趋势，防止其他力量将其利用。

二、伊朗

（一）伊朗概况

伊朗是一个西亚国家，面积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8800万，波斯人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为什叶派，7.8%为逊尼派。

伊朗历史可追溯到古波斯、安息、萨珊。7世纪被阿拉伯帝国统治后开始伊斯兰化。1925年建立巴列维王朝，1979年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已探明石油储量世界第四位，年产量世界第五；天然气已探明储量世界第二。石油开采工业为主，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和出口一半以上。40%以上为农业人口，粮食基本自给。2024年GDP折合5551亿美元，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78位（2022），预期寿命74岁（2021）。

（二）伊斯兰革命

伊斯兰革命将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变为了一个高度伊斯兰化的国家，是研究伊朗问题不可避免的话题。这其中有几个因素发挥着作用。

神职人员在伊朗的地位。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神职人员在伊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处于被西方压制的状态，伊朗国家也被西方压迫着。由此，伊朗第一批要求变革的人就是神职人员，他们在推动伊朗现代化上有积极作用。

20世纪伊朗王权和教权的冲突。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思想，还意味着一种政治与社会组织方案，因此神职人员在政治社会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伊朗王权就和教权发生着持久的冲突，巴列维企图压制教权，但也缺乏直接反抗教权的力量。

巴列维国王的专制统治以及“白色革命”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白色革命”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要求将伊朗发展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其内容包括土地改革、打压传统宗教势力、引入西方政治社会准则等。但是，在推行变革的过程中，巴列维国王的手段过于激进与专制，导致伊朗同时出现了大城市的西式生活阶层与农村的传统宗教阶层，后者对巴列维国王高度不满。“白色革命”使原来在走下坡路的宗教势力迅速复兴，形成了以霍梅尼为核心的，囊括了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左翼人士的反巴列维阵线。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一个政教合一的现代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了。与沙特不同的是，伊朗的政教合一有制度性保障。

（三）伊朗的政治制度

1. 伊斯兰国家

伊朗宪法规定，世界和人类的绝对统治权和支配权属于真主，真主赐予人民对自己命运的主宰权，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为了保证真主的意志不受歪曲，确定伊斯兰教十二伊玛目教派为国教，政府由教法学家监护。

2. 现代共和国

伊斯兰国家古已有之，但伊朗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共和国。相对传统的伊斯兰君主国而言，伊朗是一个立宪国家：1979年全民公决通过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宪法，宪法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伊朗有权力分立制衡：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归总统，司法总监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伊朗的议会和总统经选举产生。

3. 政教合一的体现和支柱

宗教领袖作为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兼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宗教领袖行使监护权的机构，具有12名成员：6名宗教法学家由宗教领袖任命，6名普通法学家由议会选举。宗教领袖由86名法学家和宗教学者组成的专家会议选举和罢免。1989年，经宪法确认，成立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协助领袖制定、监督、实施各项大政方针，当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就议案发生分歧时进行仲裁。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斯兰国家的支柱。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约44万人，与伊斯兰军队数量相当；伊斯兰革命卫队是精锐部队，成立早期参与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输出，现在主要负责伊朗核计划等战略事业。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控制着大量军事资源，而且有自己的产业，控制着大量经济资源，在经济上能够做到自足，不易受议会掣肘。

三、伊朗和沙特制度差异的原因

伊朗和沙特制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包括：

1. 沙特是一个简单的部落游牧社会；伊朗则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的农耕社会，有着深厚的政治传统与政治经验；
2. 伊朗20世纪以来就有教法学家推动立宪的传统，因而在伊斯兰革命后不会退回到传统政治体制中；
3. 20世纪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达到了顶点；在沙特，伊斯兰教法则是克服部落分立、达成统一的工具。

当然，两国也面对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伊斯兰教国家如何与现代经济政治生活、国际环境适应的问题。

第七讲 泰国

2025.5.15

一、泰国概况

泰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面积51万平方公里，人口6600万，有30多个民族，其中泰族人口占40%；94%人口信奉佛教；南部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泰国是亚洲军政府统治的代表。

2020年，泰国GDP约5100亿美元，增长率-6%；2021年GDP约5189亿美元，增长1.9%；2022年以泰铢计GDP增长2.6%，以美元计跌破5000亿美元；2023年GDP增长1.9%；2024年增长2.5%。泰国农业发达，工业为出口导向型。泰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产业升级难以为继。

二、泰国历史

（一）19至20世纪：近代泰国与军政府的统治

1855年，暹罗和英国签订《鲍林条约》，英国势力进入泰国；外国势力进入后，暹罗朱拉隆功大帝开始近代化改革。1896年，英法签订条约，把暹罗作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国。1932年，民党在军队支持下发动政变，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1932年至1991年，大部分时期为军人政府：1932~1944年由军政府执政；1944~1947年组建了文人政府，但随后又被军政府推翻；此后，一直到1973年，都由军政府执政；1973年，泰国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要求军政府下台，此时军政府内部分裂，后在1975年建立了文人政府；1976年，政府再次被军事政变推翻，建立了军政府；1988年，文人政府夺回政权；1991年，军人推翻文人政府，企图建立军政府。1992年，泰国爆发五月风暴，反对军人执政，军人开始淡出政治舞台；泰国政党政治开始运行，先后产生了四届政府，但都是少数政府，因此每一届政府都很短命，政局依然不稳。

（二）21世纪：他信势力与动荡的泰国政局

2001年，他信的泰爱泰党在议会中获得超过半数议席，形成了首个多数政府；2005年，泰爱泰党在议会中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开始单独组阁。2006年底，军人政变推翻他信政府，废除1997年宪法；与此前的军人政变后军人上台执政不同，此次军人扶持了一个过渡政府，主持起草新宪法。新的宪法法院裁定泰爱泰党在选举中舞弊，勒令解散；泰爱泰党解散后，亲他信的势力组建了新的政党“人民力量党”；2007年，人民力量党的沙马任总理，任命了大量他信的亲信。此时，泰国就出现了两股组织：反他信的黄衫军，亲他信的红衫军。2007、2008年，反他信力量开始激烈反对沙马的行为，爆发了黄衫军示威，沙马下台，原副总统、他信的妹夫颂猜上台，导致黄衫军继续大规模示威，人民力量党被迫解散。随后，在2009、2010年，亲他信的红衫军示威，泰国政局持续不稳。最后，黄衫军与红衫军的对抗以红衫军领导人投降告终。

2011年5月，泰国民主党党首阿披实出面收拾残局，解散下院；7月大选，他信势力的新政党“为泰党”获胜，他信的妹妹英拉出任总理。2013年12月，由于政权遭到反对，英拉宣布解散下院重新大选；2014年2月大选受反对派抵制；3月，宪法法院判大选无效，泰国政局再次陷入动荡。2014年5月，陆军司令巴育宣布暂时中止宪法，看守政府停止运作、军方接管政权；8月，立法会议选举巴育为总理；2017年，新宪法生效；2019年新一届国会选举巴育为总理。2022年8月，反对党认为巴育任期已到（2017年宪法规定的最高年限八年），不应继续任职；9月，宪法法院裁定巴育任期始自2017年，可以继续担任总理；但由于泰国国内反对军人接管政府的声浪很大，故巴育于2023年决定辞职。

2023年5月下院选举，远进党、为泰党成为一、二大党，但由于远进党无法获得上院的足够席位，故最终为泰党赢得了国会选举；8月，为泰党赛塔出任总理。2024年8月，他信的女儿佩通坦任总理。

从1932年至今，泰国共发生了20次军事政变，颁布了20部宪法。

三、泰国政治制度

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世袭（女性不能继承王位），是国家元首，现任国王为拉马十世（拉马王朝的第十代君主），1952年出生，2016年继位。国会分上下两院，上院250人（任命），下院500人（选举）；受提名的总理必须通过国会选举才能被任命。行政权力掌于内阁，总理权力很大。

泰国还设立了枢密院。枢密院本来是国王的秘书（咨询）机构，后来成为管理王室事务的机构，以及泰国政治、军事、经济界头面人物的枢纽，是一个宪法虽未规定，但在实践上具备实权的机构。

四、泰国政治特征

（一）军队的特殊地位

1932年后，军队曾是政治主导力量；1992年后，军人影响力下降；2006年后，军人再次走入政治舞台中心。

泰国军队之所以频繁干涉政治，是因为其不仅是一个军事集团，还是一个产业资本集团，有很高的自主性。